

“三线”建设与西北煤矿机械厂的变迁

石嘴山是宁夏现代工业的发祥地，其中围绕煤炭工业发展起来的煤矿机械制造业是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记录了原煤机厂建厂时的老人和总厂厂长王发清等，对坐落在贺兰山下的原煤机总厂、一、二、三厂筹建、发展、改组改革等情况的回忆讲述。



宁夏天地西北煤机有限公司。(资料图片)

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在西北地区兴建包头、酒泉钢铁公司，修建包兰、兰新铁路，建设火力发电厂，为了解决能源问题，开发了贺兰山等煤炭资源。

煤炭工业带动了相关工业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煤炭部在“三线”建设中，开始规划在石嘴山市贺兰山东麓建设西北煤矿机械厂。

在煤炭部最早的规划中准备筹建9个厂子，最终要搞一个煤矿机械制造业的托拉斯，后因“文革”的影响，只建了一、二、三厂3个厂子，没有西北煤矿机械总厂。

一、二、三厂是“三线”建设时期按照煤炭部的要求，从1966年开始同时选址筹建，后因“文革”，来的人又撤了回去，直到1968年才正式开始建设。

基本建设是由煤炭部79、80、81工程处承建，这3个处各负责一个厂的建设，几乎是同时开工，同时建成投产。

按照煤炭部的文件精神要求，当时一厂是由张家口煤矿机械厂负责筹建，先后从张家口来了700多人；二厂是由淮南煤矿机械厂负责筹建，从淮南来了200多人；三厂是由抚顺电机厂负责筹建，从抚顺来了200人，主要为二、三厂配套防爆电机，企业规模比较小。

刚开始筹建一、二、三厂时都带有战备性质，各厂都由军代表负责管理，厂房建得很小，这是从战备的角度考虑的。

这3个厂子刚开始都属煤炭部管，不久煤炭部又将他们下放给贺

兰山煤炭公司管理，而贺兰山煤炭公司当时管理着西北五省及内蒙古西部的煤炭企业，也就是从内蒙古到新疆这一片煤矿都归贺兰山煤炭公司管理。

到了1970年全国企业管理权限下放，这3个厂子又下放给宁夏管理。

宁夏当时煤炭行业主管部门是燃化局，煤炭、化工行业都归燃化局管。燃化局接收一、二、三厂后，决定成立西北煤矿机械总厂，具体管理一、二、三厂和西北煤矿技工学校。

当时国家正式批准的有4个县团级单位，就是一、二、三厂和技工学校，技工学校也是同期煤炭部办的学校。

从当时的情形分析，一方面燃化局按照煤矿管理体制，即矿务局管煤矿的体制，想成立一家单位具体管理一、二、三厂和技工学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置“文革”受迫害的老干部，在成立总厂时，矿务局系统许多受迫害的老干部先后被安排到总厂担任领导。

1973年，自治区和煤炭部批准成立总厂时，企业名称是西北煤矿电器厂，在后期的发展中又改名为西北煤矿机械厂，最后又叫西北煤矿机械总厂。主要负责管理一、二、三厂和技工学校这一片，全长7.5公里。

总厂成立后，从矿务局及周边一些单位来了一大批干部，后来贺兰山煤炭公司又来了许多干部。

成立总厂并没有真正把一、二、三厂全统起来，一、二、三厂始

终保留着法人资格。因为这3个厂都由原厂建制搬迁过来，生产的产品不一样，地区也不一样，人们的生活习惯、民风习俗等都不一样，想把3个厂的人融合到一起很难。

在那个历史时期，实际上总厂就是机关，名誉上它是个实体，其实仅仅起了一个上传下达的作用。

在1980年左右，总厂想把一、二、三厂按专业化进行整合，即把各厂相同重叠的设施、工艺分类整合，比如把一、二厂的锻造合并到一厂，把这两个厂的铸造合并到二厂，而原来都各有各的一套人马，一些生产环节是重叠的。后来因两个厂调整的人员难以融合，大部分来的人又返回原厂，最后没有搞成。

这几个厂子最早归煤炭部机械制造局管，交地方后，从行业讲依然归煤炭部机械制造局管。

1983年厂领导班子调整中，将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的原总厂领导班子“一刀切”，一批新人走上厂领导岗位。新领导班子组成后，正逢国家抓企业整顿、企业管理，总厂才跟着抓起了企业管理。

1984年，在国家倡导领导干部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时，王发清被选拔到总厂当副厂长，后来担任总厂厂长。当时，二、三厂和总厂共有全民职工7600多人，加上集体职工，近1万人，其中总厂机关就占了1100多人，企业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这个企业发展的出路何在？

当时发现总厂其实阻碍了

一、二、三厂的发展，因为一、二、三厂虽为法人实体，但他们都不对外，对外完全由总厂负责，而内部生产则由各厂自行安排，总厂左右不了各厂的发展，还背着沉重的包袱。

总厂虽是法人，但不是实体，既没有产品，也没有销售，不创造价值，怎么生存？

那时每年主要从煤炭部争取资金解决总厂的生存，为解决总厂的生存与发展，首先对总厂机关和下属企业人员进行了精简压缩。当时搞了几条规定，采取哪儿来的哪儿去，后期调进的先留下，对厂属医院、学校等单位采取简政放权，鼓励其自主发展。结果这次改革一次精简管理和辅助人员600多人。

也曾设想组建西北煤矿机械制造集团，但后因各厂的想法不同，最终没能统起来。最后总厂发展陷入困境，经请示自治区同意，撤销了总厂。

从技术和产品质量来讲，这几个厂子搞产品开发比较早，当时主要为了生存，技术是从引进仿造开始逐步演变来的。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提出要建10个大庆、10个开滦，一些专家认为国外的煤炭综采设备效率高，一个工作面年来煤上百万吨，建议我国引进。

随后国家从7个发达国家的17家公司引进了100套大型综合采煤设备，但引进后才发现这些设备与中国的煤矿不适应。我们的矿井工作面巷道窄，运输条件也不具备，综采设备一时难以发挥作用，后来开始挑选一些典型的矿进行推广。推广中综采设备的零部件损坏怎么办？这种情况下国内的煤矿机械厂都开始制造国外综采设备的零配件，国内第一台煤炭刮板输送机是1982年在一厂研究成功的；二厂是皮带输送机，其产品研究成功也比较早；三厂生产防爆电机。

现在这3个企业分别更名为天地奔牛集团、西北煤机制造有限公司、西北骏马煤矿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石嘴山市逐步形成了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煤矿机械制造业基地。

(摘自《石嘴山往事》)

虎家小园子：诞生宁夏农村第一个党支部

虎家小园子位于宁夏彭阳县东部边缘冯庄乡境内，和甘肃省镇原县相连，地处泾河流域在蒲河上游的雅石沟河和安家川河的交汇点。

虎家小园子党支部是固原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也是宁夏境内农村最早的地下党支部。

虎家小园子坐落于彭阳县东部边缘冯庄乡境内安家川河和雅石沟河交汇处的一条弯弯曲曲大山沟里。这里群山起伏，沟壑纵横，东面毗邻甘肃省镇原县三岔镇。

1936年6月，红军西征部队解放了今彭阳县东北部，驻防在三岔一带，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抗日组织，并不断向西推进。深秋时节，对红军知之甚少的虎家小园子群众，听说红军很快就要到来的消息后，大部分人跑到山沟里躲避。过了几天，三岔传来消息说红军纪律严明，待人和善。到三岔红军驻地打探消息回来的村民王克俭也说，红军待人特别客气。但是，当腰里别着一支手枪的张万年和背着一支长枪的徐步起两位红军干部进入村子时，许多老百姓还是藏了起来。

这时候，留在村子里的虎克敏看到进村的两位红军面带微笑、和蔼可亲的样子，便主动和红军干部接触，请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听他们讲革命的道理。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群众消除恐惧心理，积极配合红军的工作。红军干部张万年不分昼夜地接待群众，逐一谈话，了解情况，讲解政策，待时机成熟，主持召开了全庄群众大会，宣讲红军政策，民主选举成立了三岔三乡苏维埃人民政府。王克俭任乡主席，虎克敏任副主席兼文书，并设有土地、武装、政治、粮秣、调解等委员，负责抗日组织工作。办公地点也从虎克敏的家里搬到堡子山上。

乡政府成立后，虎克敏等几位地方工作者积极宣讲红军政策，组织群众打土豪分财产，运输粮食支援红军。1936年1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在虎家小园子堡子山上的窑洞里，张万年、徐步起主持了虎克敏、王克俭、王国政、虎克贵等5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摇曳的油灯下，5名平日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实巴交的农民，迎着鲜红的党旗举起了右手庄严宣誓，固原境内第一个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虎克敏任党支部书记，王克俭和另外一位同志为委员，王国政、虎克贵为成员。党支部成立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级党组织决定虎家小园子党支部

的活动由安家川扩大到三岔、孟塬、马渠一带，虎克敏带领支部一班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就发展了10多名党员。他们深入发动群众，调查了解敌情，掌握敌人动态，积极向上级组织汇报，紧密配合红军开展地方工作，广泛深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掌握群众思想，消除群众顾虑，动员群众起来与当地土豪劣绅、反动武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安家川保的保长刘武，仗着固原县伪保安队中队队长卢业广的关系，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在群众中大搞反动宣传，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甚至威胁恐吓群众不准参加红军召集的村民大会。虎家小园子党支部及时将这一情况向驻三岔工作团团长(时任曲子县委书记并兼任固原县委书记)的李庭序作了汇报，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密切配合下，逮捕了安家川保的保长刘武，并送到三岔工作团的驻地关押。贪生怕死的刘武经审问教育，供出了他所藏匿的枪支和苛榨下的大量银圆等物，并主动要求给家里写信，让赶快把枪支等全部交出。他家先后交出长枪5支、手枪10支、银圆500块、麦子5石以及铺子里的全部东西。这次除恶行动，不仅打击了当地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而且还有力地支援了边区红军。

后来，由于三岔工作团发展政权组织的需要，虎克敏和王克俭被调往老庄壕组建新区。撤离老庄壕后，虎克敏又调任三岔区委工作。虎家小园子党支部经调整后，继续坚持工作。

1938年，国民党自卫队长卢业广指示其部下祁杰山和伪保长柳生海乘国共合作、共产党一心抗日不打内战之机，企图占领小园子。安家川副保长、中共地下党员杨国仓到三岔向党组织报告了敌人马上要占领虎家小园子的情报。虎克敏接到情报后，冒着生命危险，马上向当时曲子县委书记徐锡铃请示对策，但由于当时敌情复杂，党组织未能及时果断采取措施，致使虎家小园子支部遭到了敌人的破坏。敌人占领虎家小园子后，开始疯狂地搜捕共产党员，部分暴露身份的党员被迫转移到边区，未暴露身份的隐藏了起来。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支部工作中断。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这一带党的组织活动才重新恢复。

(据固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孙璞：解放后银川首任市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上，有许多许多家庭因敌人的残酷迫害而家破人亡，但他们在面对敌人以家人生命相威胁时，毅然选择为革命事业牺牲自我，中共宁夏工委第一书记孙璞的家人即是如此。受红军影响，孙璞三兄弟先后参加革命，国民党当局将其父亲逮捕入狱并威胁道：“只要孙璞兄弟回来，不给共产党做事，就可以放人”。由于父亲拒不妥协，最终被敌人折磨致死。

孙璞，1915年8月出生在宁夏盐池县一个牧民家庭，祖辈以放牧为生。1935年，孙璞中学毕业后回盐池县城完小任教。1936年6月，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红七十八师韩先楚部解放了盐池县。当时孙璞目睹了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官兵平等、尊重群众等场面，于是暗下决心，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

新成立的盐池县委吸收了大量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到各乡乡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孙璞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后被分配到盐池县三区五乡任文书，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在县委书记王敬民的培养下，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7月，回到宁夏任盐池县代理县长。

自从参加革命后，孙璞就把一切献给了党的事业，在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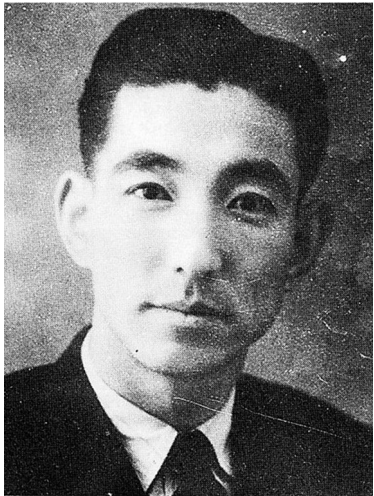
持工作期间，带领人民群众开展开荒种地、打盐运盐、办合作社、大生产运动等工作，亲自指挥盐池县游击队配合西北野战军和回汉支队的军事行动，与马鸿逵部队及清乡团展开了顽强的游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盐池县人民的斗志，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1948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战争形势迅速发展。随后，西北野战军收复了陕甘宁根据地，把战线推进到西安附近，解放宁夏的问题逐渐提上日程。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委，孙璞为第一副书记。工委的主要任务是为解放宁夏做好一切准备工作。1949年9月中旬，中共宁夏工委全体成员组成4个工作组，由赵忠国书记和孙璞副书记带队，到已解放的各县协助部队工作。9月23日，银川解放。9月24日，孙璞开始负责银川市工作。9月29日，银川市人民政府成立，孙璞任市长。

刚刚解放的银川，百废待兴，孙璞带领新政府班子成员，协同银川市管会接管政权，建立新政权，没收旧官僚资本，打击残余反革命势力，维护社会秩序，创立新的社会体制，发展经济，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为银川市的政权巩固和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据银川党史网)



孙寿名：宁夏最早的民盟成员



孙寿名。(资料图片)

原民盟甘肃省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的孙寿名，原名义德，宁夏固原县人，生于1916年。他生前在党的领导下，在西北从事民主爱国活动多年。1949年8月被国民党秘密杀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年仅15岁的孙寿名，怀着抗日救国的愿望，入伍于甘肃新一军邓宝珊的新一旅，任司书。后到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学习，毕业后回原部队任排、连长及旅参谋等职。

“七七”事变后不久，适逢该部要派一个抗日先遣营去前方，孙寿名被任命为先遣营营长。他率领西北健儿开赴前方，被编入第二十七师，曾参加过中条山、永济等战役。

1940年，他被调回西安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上校区

队长。当时中共地下党员任教官曾主动给他做工作，讲解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使他逐渐对中国革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1941年，他率领旧部张子铭、石挽澜、高月波、焦国栋等十余人离陕到甘，希望从国民党内部寻找机会，打开局面。在担任甘肃省保安第二团团长期间，他策动了岷县农民武装起义，但因泄密失败，被调回兰州软禁。后因没有拿到什么证据，此案便搁置起来。在此期间，他刻苦研读马列书籍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著作，专心致志地投入民主活动。1943年，他为了团结进步力量，有组织地进行抗日民主活动，秘密联络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的进步青年数十人，在兰州成立了“西北青年民主促进会”，简称“西进会”，以“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抗日，反对内战”为纲领，制定了会章。吸收会员的对象是主张民主和爱国的军人、公务员和学生。活动方法是从宣传抗日救国，反对贪污腐化入手。他被选为领导人之一。同时，他还代表“西进会”参加了当时民主党派的联合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西进会”接受中国民主同盟领导，将会员称为民盟盟员。贯彻民盟中央提出的“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专政；主张抗日到底，反对中途妥协；竭诚与中共党员合作，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的政治主张，并积极发展武装力量，以甘肃为活动中心。

1944年冬季，民盟西北负责人

杜斌丞到固原开展民盟的工作(当时高桂滋部在固原驻防)，与孙寿名回顾了以往的教训，商讨未来的活动计划，并决定取消“西进会”之名。此后孙寿名在平凉和任谦(当时任平凉专员公署保安副司令)共策共励，密切配合，坚持民主活动。为了掩护同志们秘密集会和研讨工作，孙寿名领导盟员郭耀山等，在固原南关租赁杨宏毅的房子，挂牌成立“利华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国民党特务对此已有所察觉。为了顺利进行工作，孙寿名遂于1945年春在平凉担任了国民党第三十八集团军副官处处长。日本投降后，该部奉命移驻河南，他途经西安，又与杜斌丞多次接触。此事被特务侦知，一到河南，便调任他为由职无权的高参。

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依靠美帝国主义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爱国进步人士大肆屠杀，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惨遭杀害。孙寿名愤慨地说：“我们要对敌人以牙还牙，不能束手待毙。”即电邀在甘肃工作的唐铁僧，并拟出计划一份，让唐铁僧密交杜斌丞审阅。这年，他被裁减分到西安军官总队，便利用失意军人的不满情绪继续进行工作，启发他们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并发展了一些盟员。

当时开展工作，他曾多次向《秦风日报》《工商日报》投稿，无情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报社被特务捣毁后，他联络高建白、郭建化等人筹办《民主周刊》，但因特务破